

基于符号资本的现代性批判实践逻辑 考察及其伦理确认

贺敏年

摘要：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关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解释困境体现在对社会关系之本性的不同见解中，这呈现在交往与权力的对峙中，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社会空间的动态平衡。随着“符号资本”概念在社会解释中的引入，这一动态特征的刻画便建基于话语实践的运行结构及其经济学转喻下的表征功能。在宏观场域阶层上，符号资本既是话语实践的基础，也是社会流动性的动力根源；在微观层面上，话语实践塑造了符号资本的自我关涉性，并将符号资本引向在现代社会场域中的伦理确认。基于此，“符号资本”的概念扩容导向一种实践经济逻辑的规范内涵，后者为走出交往与权力之间解释困局，应对当代渐趋复杂多元的现实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与实践动力。

关键词：现代性批判；符号资本；话语实践；伦理确认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2—0011—07

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下，资本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显著地体现在如下双重性中：一方面，对于资本性质的理解随着有关社会关系之决定性方面的不同侧重而发生偏移，另一方面，现代资本的不同表达形式反过来影响并塑造着社会关系的复杂结构。宽泛而言，存在两种表征社会关系之决定性方面的模式：交往模式与权力模式。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刻画了社会关系的规范特征，并且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与资本的微观镜像中显示出各自解释力的不足。资本与社会的复杂关系需求某种更加系统的透析，这点依赖于一种概念上的深度扩容。在很大程度上，“符号资本”正是用以标示这种复杂关系的一次有力的概念调度（尽管仍是局部的），其中，现代资本社会经由理性交往与权力运作的双重淬炼，在现代性话语实践中被部分地转化为特定的、虚拟的、自反的象征结构，这些结构化运作及其动力属性进一步规定了符号资本的伦理确认。

一、话语实践：交往与权力

在经典现代性叙事中，“合理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交往理论假定，合理性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素质，表现在总是能够得到充分证明的行为方式当中”^①，权力理论则将合理性视作显示“理性—非理性”区分的差异化模型，合理化过程体现为理性通过知识话语的权力运作不断地将其排斥的部分“独异化（Singularitäten）”，从而获得某个加以认识、解释和控制的有效空间。由此，二者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维特根斯坦实践哲学方法论研究”（项目号：19CZX0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敏年，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① [德] 尤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42页。

在合理性视野下就社会解释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维度，即话语与实践的关系。

实际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正是聚焦于话语的方法论功能启动了对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理论的诊断。他将考古学研究视作一种话语分析、一种深层解释学，后者“试图用同一性的思想手段来打破同一性思想自身的魔力，以便在工具理性的发生史中追溯单子化理性最初的僭越和脱离模仿的场所”^①。对福柯而言，话语既非对原初意义的主观陈述，也非一套外在于历史的独立运作的能指系统，而是对历史构型轨迹及其终极差异的描述和揭示。话语是一系列“事件”，而事件在否定性方面是对事实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实践网络的割裂，在肯定性方面则是“历史复杂限定的结晶”^②。正是基于对真实性要求及其“更好论据的非强制性”特征的轻视，显明了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关键分歧。哈贝马斯指出，对于论证有效性要求的解除表明话语的真假识别将转向一个纯粹内在于事件的领域，一个内嵌在话语、权力、机制、以及实践格栅中的运作，而“真理即是一种隐伏着的排斥机制”^③。由此，话语与实践的关系就转换为结构与事件的关系，而这点在福柯那里仍然晦暗不明。

结构自身难言真假的特征拒绝一切“更好论据的非强制性表象”，因此福柯只能转向结构在话语实践中所表达的意志及其谱系，描述话语自身的形成、转化与消亡。哈贝马斯将这种无视角的描述性立场揶揄为“幸运的实证主义 (felicitous positivism)”^④。对他而言，更好论证非强制的导控功能恰恰是一切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作为“理性复苏”的召唤者，哈贝马斯将理性视为人类的基本力量和素质，从一开始就体现在交往行为语境和生活世界结构中；理性“乃是人类事务较少出现例外的缘由，也是人类有意识调节下的强制规范和主张的根源”^⑤，因此，“一切论证都要求同一种相互寻求真实性的组织模式，凭更好论据使主体间相互信服”^⑥。于是，理性就从“主体—意识”哲学的独白状态转向一种以有效性要求为导向的“交往理性”。对哈贝马斯而言，话语的功能并不在于呈现蛰伏在历史叙事中的事件，而在于话语自身的非强制性的一体化（共识）力量，后者使以有效性要求为导向的交往行为得以可能。在实际交往中，有效性要求构成一种绝对的因素，它们既超越任何局部语境，同时协商、承认和接受它们又需要一定的时空约束，这种两面性合力将言语行为组织为特定的话语实践。

由此，关于话语实践的两种整合形态（基于交往有效性要求的“言语行为”与交织在权力关系中的“话语事件”）在社会解释层面上均面临某种困境。无论是有效性要求的达成，还是权力聚块的生成，二者均承诺一种实质的、绝对的本体因素，从而期许一种有关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直接说明”，这点尤其体现在资本关系的界面上。交往关系模式强调理性在人称转换中对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主体的调度与平衡，通过诉诸社会关系之外的高阶基础（比如合理性、交往理性）来实现社会关系在资本场中的相对稳态。在交往关系中，资本的表达更侧重于一种“具身化的 (embodied)”形式，如体现为特定的语言游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力关系模式则旨在揭示社会资本关系的有效性依赖于权力关系自身的传导、增殖和转化。在权力关系中，资本的表达更侧重于一种“客观化的 (objectified)”形式，并且具有一定的物质外观，如艺术品、科学配置、文化载体等。问题在于，两种解释模式仅着眼于资本社会的一个局部面向，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流动性、自反性与虚拟性之间的联动特征。换言之，对于资本社会只能提供一种“间接说明”，这点要求一种新的概念调度，而这正是“符号资本”概念的要旨所在。

二、“符号资本”

在某种程度上，交往与权力关系将“资本”概念框定在经济学场域并且置于一种衍生地位：要么是

① Jürgen Habermas(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240-241.

② [法] 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③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248.

④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248.

⑤ [法] 芭芭拉·福尔特纳编：《哈贝马斯：关键概念》，赵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⑥ [德] 尤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57页。

一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特定产物，要么是权力运作的特定介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则敏锐地意识到资本在社会解释中的扩容性，“事实上直接对社会世界的结构和功能加以解释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我们重新引入所有形式的资本概念，而非仅仅在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学理论对资本的使用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种对于经济实践的定义本身是资本主义的一项历史性发明”^①。

这种概念扩容要求重新审视社会关系的决定性方面。对于布尔迪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就某一方面给予实质的确定，而是如何突破经济与非经济、物质与价值、具身与客观之类的二元框架，针对所谓决定性关系的本性及其背后的“误识（misrecognition）”机制进行有效的质询。他由此借助“习性（habitus）”与“场域（field）”之间的交互作用，将资本纳入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系统、一种不断转化和流动的实践关系中，它们合力构成一种社会空间。真正重要的是符号资本所属场域之间互相联系的矩阵，“从某一维度上看，一个确定的标签序列其定位往往与其文化上的一系列补集相连，并通过其对立面而处于另一种否定关系中。相似性逻辑于是就被自动地赋予了一种差异性逻辑，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非连续的，而这些关系就以结构的方式建立起了社会空间”^②。在由习性和场域所钩织的实践关系中，符号与资本之间的深层运作产生了强大的效能。符号资本规定了场域运行的法则并且呈现为一系列象征机制，它们构成社会分级的动力。

布尔迪厄旨在借助一种经济学隐喻来重构社会实践。他假定社会实践根本而言是一种“利益导向活动（interest-oriented action）”^③，并不存在所谓的无功利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承认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粗糙的经济主义，恰恰相反，符号资本意在突破经济主义方法论的狭隘性，旨在一种同时关涉社会、文化与经济资本框架下的整体历史态度中全面把握社会实践的内在纹路。因此，在一种象征性界面上，社会关系与符号资本之间并非单一的映射关联，而是一种“现象学的导引”，亦即一种基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态度。其中，个体经济实践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基于预设的筹划，实践中所发生的事情是由利益的强度决定的，“当个体面对客观的社会条件时，过去已经被带入了未来的筹划，并且过去就是呈现在现在之中”^④。正是这种整体态度下的筹划显明了经济主义及其预设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想性，它们忽视了任何个体习性之所以是理性行动，是因为预设了一种在具体而恰当的社会时空中对经济与文化资本的占有。布尔迪厄指出，由于经济主义不承认资本主义通过某种真实的抽象化操作产生出人类关系利益之外的利益，经济主义也就无法真正把握“象征利益”。事实上，在一个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几乎可以完全互相转化的世界，引导行为策略的经济计算会通盘考虑被狭义的经济定义所无意识地丢进非理性范畴的收益和损失。简言之，“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范畴中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意象相反，实践即便在显示无私的表象时也依然遵循经济计算，因为实践摆脱了狭义的利益计算的逻辑并转向了非物质和难以量化的范畴”^⑤。

布尔迪厄揭示出（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重要区别，即由一种财富最大化的利益观念转向对社会实践之根本的经济本性的揭示，这点集中表征为经济资本大规模、大范围地转化为复杂多元的非经济资本形式（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并且逐渐成为场域利益的优先表达媒介。这些媒介已经是符号化了的，但是潜在的理性基础仍然是经济的，“绝大多数的行动在客观上是经济的，但是在主观上则是非经济的。我们的利益根本上讲还是以经济为后果的，但是却并不总是全部以经济术语来表达”^⑥。布尔迪厄由此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论断：“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实践理论只是实践经济的普遍理论的一个特例”^⑦。

① Pierre Bourdieu(2006).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UP Oxford, 105-106.

② Michael Grenfell(2008). *Pierre Bourdieu: Key Concepts*, Acumen Publishing Limited, 108.

③ David Swartz(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0.

④ Michael Grenfell, *Pierre Bourdieu: Key Concepts*, 163.

⑤ Pierre Bourdieu(199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7.

⑥ Michael Grenfell, *Pierre Bourdieu: Key Concepts*, 158.

⑦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177.

三、实践经济逻辑

在此，重点在于符号资本包含着一种对具身性和客观性的双重挣脱。在“场域—习性”不间断的结构化建构中，符号资本的动态平衡式的自主变化与代际更替为理解社会世界的流动性赋予了新的视角，这点牵涉到对理性能力的重新审视。在符号资本镜像中，理性功能从一种基于有效性与合理性的机制性的“决断”（determination）转向基于整体历史实践态度的符号化的“牵引”（instruction）。布尔迪厄指出，存在一种实践的经济、一种内在于实践的理性，其原初性并不基于理性算计或机制性决断这类外在于行动者的东西，作为一种理性实践的结构化建构，这种经济可以通过所有种类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得到界定。正是这种理性实践的自洽性恰恰构成正统经济学的盲点，后者忽视了如下事实，即“实践有着自己的原则，而这种原则与机制性的归因，或者说有意识地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则不同，并且也不属于固有的经济学逻辑。实践型塑了一种经济，亦即，它遵循一种内在理性，而这种理性是不能被狭隘的经济学理性所限定的，因为对于这种实践经济的界定需要诉诸更大的范围和目的”^①。

这种广泛运行在符号资本界面上的内在理性构成组织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动力源泉，它突破了经济与非经济的藩篱，揭示出前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共性，即一种在符号资本的转换交易所展现出的实践逻辑。基于这种实践逻辑，布尔迪厄意在构建一种更为综合的社会实践理论，一种关于实践经济的普遍科学，后者“能以对待旨在将物质或象征收益最大化的经济实践的方式对待所有实践，哪怕是一个所谓无私和免费的因此无经济意义的实践。作为社会物理学能量的集团聚集的资本，符号资本总是不断与其他资本联系并根据使用方法增减”^②。因此，符号资本既是狭义经济和物理资本的转化形式，同时也构成它们的某种隐匿模式。这种隐匿旨在掩盖如下事实，即资本的物质形式恰恰就是产生符号资本及其效果的原因。只有隐藏了这一事实，符号资本才可能产生其自身的效果。

因此，包括狭义经济关系在内的多元社会结构只有在一种符号化的实践逻辑中才能得到理解，这点再次触及有关话语和实践关系的重新定位。在符号资本镜像中，话语实践与实践经济的本性紧密相连。符号化的实践逻辑类似于一种宗教运作，它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建构一个“完善幻象（well-founded illusion）”的职责。它在虚拟的社会关系中植入了一种真实性，并且在习性和场域的整体实践中被塑造为一种趋向未来的游戏感。在这种游戏实践中，社会关系便逐渐由一种单纯理性引导的“生活世界”转向一个符号化的“后资本”的实践场域，其虚拟性、仿真性以及多元对应性均旨在解除“社会关系之决定性方面”这一理论幻象。正是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基于有效性要求的交往关系，还是隐藏在话语事件中的权力关系，二者都试图在这种“决定性因素”的信念下寻求对具体生活实践的整合，从而共享了某种方法论上的激进性。而在实践逻辑的运行中，这种游戏感的象征性在一种“意在未来”的实践经济的整体趋向性与个体行动的自主性之间建立了某种深度平衡，人们“可以拥有理性但不必依赖理性来思考，可以非常‘经济’但不必对利益锱铢必较”^③。即使生活实践整体上朝向未来，但种种关于未来的行动始终是当下的。因此，这种游戏感总是提醒人们，一个游戏只有在忘记自己是游戏的情况下才是一个好游戏。

然而，象征游戏同时也为交往和权力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汇通。无论是实践经济中的利益还是这种利益基础上所孕育的价值，它们总是一种历史建构的产物、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而游戏感本身就随附着特定习性场域中社会关系的分层，而当代社会的这种层级和不平等及其带来的苦难，更多的并非源于身体性的强力，而是一种符号统治。这种统治并非一种物理压制或屈从，而是处于象征游戏中的行动者根据自身社会身份来进行利益表达就必然所伴随的一种“符号暴力”，而人们通常总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成为符号暴力的一员。由此，无论是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还是权力话语的压制性，它们实际上均是这种符号暴力在言语实践中的特定例示，同时也彰显了符号暴力与语言的紧密联系。事实上，

① Pierre Bourdieu(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Polity Press, 119.

②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183.

③ Michael Grenfell, *Pierre Bourdieu: Key Concepts*, 165.

符号暴力同时也是语言所带来的后果。在布尔迪厄看来，和交流相似，语言也是权力和行动的工具，语言自身就是一种统治形式，随着符号统治在所有社会建构中的深度渗透，它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也日益重大。

更重要的，这种基于语言的符号统治往往会被社会成员误识并加以内化，从而加固这种统治性的符号系统。在特定场域中，既得利益者往往会相当程度上圣化这种符号系统，同时促进其再生产，其结果就是符号暴力的不断增长。由此，布尔迪厄扩展了暴力的形式，并且由于符号系统的误识机制使得挣脱它将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符号统治构成了实践经济的动力基础，而符号资本毋宁可被视作这种统治形式的一个经济学转喻。于是，符号资本的概念似乎就将社会关系的说明置于一个黯淡无边的境地，更无法挣脱隐藏在其背后的那种暴力统治的普遍阴影。

四、现代性场域中的伦理确认

符号化进程中关于“真实幻象”的本体建构同样暗示着一种可能的“解放”。如果对一个建基于符号资本的社会关系同样秉持一种整体的历史实践态度，那么至少它首先显明了符号资本本身也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进程，这种反思性鼓励了一种关于符号暴力及其统治本性的“正在生成的意识”，亦即符号资本本质上依赖于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逻辑、一种在此逻辑中不断进行的伦理确认。由此，社会关系的建构性保证了自主行动的可能性，而对于符号统治的反抗符码就潜藏在种种幻象背后的异质形式里，后者包含了“一种变动不居的、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力量”^①。这点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确立一种多层次的反思概念，借此来揭示建构秩序的潜在机制与符号暴力，从而导向一种基于伦理反思的联合。正是在此符号资本的伦理确认中包含一个重要洞见，即生活实践的规范性根植于一种个体人性的生命伦理。这点无疑成为连接交往、权力与符号资本的重要焊点。

实际上，在现代性实践中，现代主体的自我关涉性要素在意识哲学中所遭遇的困境构成了哈贝马斯与福柯共同的主题。他们看到，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现代主体的一种自反化本性，后者在意识哲学范式中迫使主体从互不相容的方面来建立自我关涉（诸如“经验—先验”“自在—自为”“源始—创造”等），最终导致主体的一种“自我折磨的两重性”^②。对于福柯而言，这种主体的伦理困境可归咎为一种普遍的求真意志对主体动力基础的遮蔽，后者是一种渗透在自我认识与自我物化中的结构性意志、一种依附于权力实践的权力意志。因此，自我重合的诸样态在福柯那里毋宁说就是这种结构性意志在不同层面上的权力效应。于是，主体的个体化与内在化之间的二维张力就在自我关涉的维度上转换为个体化、内在化与权力意志的客体化之间的三维张力，而福柯对此提供了一种激进的应对程序：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将自我的内在化扩张为普遍权力意志的结构化渗透，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将自我的个体化过程收缩在权力关系运营下的一系列临界经验，二者最终合力将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抛至一种绝对的客体化漩涡、一种永恒的“时代的宿命”^③里。诚如哈贝马斯指出的，权力理论隐秘而结实地拥抱了主体哲学的内核，而一种福柯主义的自我治理的证成术最终只不过沦为了一种独白静默的“美学内省”^④。

对哈贝马斯而言，现代主体的伦理困境实际上恰恰是体现“意识哲学范式穷竭的症候”^⑤，而消除这种症候的方式就在于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而主体的自我关涉性则从客体化立场转向了一种人际关系中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一旦自我做出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由言语者、听众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视角系统构成的人际关系”^⑥。哈贝马斯据此指出，言语行

① Pierre Bourdieu(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olity Press, 277.

② [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309页。

③ [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327页。

④ [德]米歇尔·福柯：《主体性与真理》，张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1页。

⑤ [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347页。

⑥ [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348页。

为的规则性对“经验—先验”的超越、交往情境的共通性对“自在—自为”的熔炼以及社会系统的多级性对“源始—创造”的兼容分别克服了前述自我重合的三重压迫^①，从而使那些困境失去了意义。于是，语言关系中的三元人称转换与完成行为式的有效性要求共同构成言语主体自我确证的界限，从而取代了意识哲学单纯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基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的一种特殊的反思性的自我关涉性。它无关乎以客体化方式与自身建立关联的认知主体，而是关乎交往行为中话语和行为的分化，亦即围绕假设的有效性要求所展开的各种论证。在反思层面上，“主体间性关系的基本形式在支持者和反对者对峙的过程中获得了再生产，这种主体间性关系一直都用于接受者的完成行为式关系来调节言语者的自我关系”^②。由此，主体间的交往、理解与承认就包含了一种交往理性的约束力，它将一种合理化的规范内容灌注到主体间的人际关系从而将后者组织为一种稳定、共同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现代主体的伦理确认向交往理论与权力理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课题，亦提供了共置二者的理论资源。但是，它们在社会解释层面上各自所面临的困境同样阻滞了这种融通。无论是源自交往理性的合理论辩的规范，还是基于权力运作的结构化形塑，它们均无法真正穿透那种流转于主体间的强制性阴影。换言之，主体的伦理确认只能在一种象征化的界面上予以施效。如前所述，在一种经济学转喻中，符号资本为此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反思视角。在符号资本镜像中，符号化的实践逻辑一方面促动话语实践的符号化进程逐渐从“普遍（形式）—情境”的语用学对峙中实现跃迁，并使交往关系与权力关系在此符号实践中转化为复杂的符号增殖与符号暴力；另一方面，亦在习性和场域的整体实践中塑造出一种趋向未来的游戏感，后者在一种实践经济的整体趋向性与个体行动的自主性之间确立了某种平衡，从而将基于交往理性与权力关系的主体确认纳入一种基于多重伦理反思的联动筹划。问题在于，在应对上述那种潜存于符号化进程中的普遍的暴力阴影时，这种基于伦理反思的实践逻辑所能提供的理解效能是否足够坚实？

事实上，这亦是布尔迪厄的实践逻辑理论所面临的核心难题。诚如沙兹基（T.Schatzki）指出的，尽管布尔迪厄明言自己是一个反表征主义者（antirepresentationalist），但是，在试图将习性置于某种话语分析的影响之下时，他无疑臣服于自己一贯反对的那种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③根本而言，“布尔迪厄的错误就在于试图用‘实践逻辑’这样的表述来刻画‘习性’这类概念”^④。通过对维特根斯坦所谓“家族相似性”的反本质主义内涵的解析，沙兹基指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涵盖一切游戏实践的逻辑公理。同样，“我们也无法构建一种充足的实践逻辑、一种能够决定如何达成可理解性的充分的表征原则”^⑤。由此，布尔迪厄就面临一种元理论上的自我消解的风险，而沙兹基亦敦促他停止“对实践智性给予一种系统的表征主义的说明”^⑥。

更深一步，沙兹基的批评涉及一种实践逻辑的观念与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教导是否兼容的问题，这点进一步触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与维特根斯坦哲学之间的深层联系^⑦。事实上，仅从方法论上看，布尔迪厄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维特根斯坦的批判标靶。他本人亦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理论意图在维

① [德] 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 349—351 页。

② [德] 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 375 页。

③ Theodore Schatzki(1997). Practices and Actions: A Wittgensteinian Critique of Bourdieu and Giddens, i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7, 283-308.

④ Kevin Cahill(2016). The Habitus, Coping Practice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Ground of Action, in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46(5), 498-524, 504.

⑤ Theodore Schatzki. Practices and Actions: A Wittgensteinian Critique of Bourdieu and Giddens, 296-297.

⑥ Theodore Schatzki. Practices and Actions: A Wittgensteinian Critique of Bourdieu and Giddens, 297.

⑦ 事实上，布尔迪厄承认来自维特根斯坦的直接影响。在《实践理论大纲》中，他在引用《逻辑哲学论》的一个断言后指出，“哲学旨在对思想进行逻辑澄清”，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分析或可被视作是一种哲学”。（参见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30）同样，在 1985 年的一次访谈中被问及与维特根斯坦的联系时，布尔迪厄回应，“就自己眼下所处理的难题而言，维特根斯坦恐怕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在一个智性大萧条时代里（比如不得不质疑‘遵守规则’这类常识或者必须解释‘将某个实践付诸实践’这样简单的事物），他毋宁是一位救世主”。（参见 Kevin Cahill, *The Habitus, Coping Practice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Ground of Action*, 500）

特根斯坦那里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不同于维特根斯坦所设想的那样，我的工作并不止于对命题的澄清。它们意在回应各种科学上的困难，而非文本解读，通过提出一种研究和确证程序从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①。因此，所谓实践经济逻辑亦是一种基于科学程序所推进的结果，借此对内在于包括经济活动在在内的一切现代实践的有效性条件给予系统的刻画。尽管如此，在一种习性和场域的整体实践及其趋向性中，仍然可以捕捉某种有关维特根斯坦思想在符号资本场域的淬炼中被赋予的崭新内涵。对于布尔迪厄，一种经济学转喻下象征化的实践逻辑使得有关话语实践的有效性认定突破了具身化与客观化的坚硬壁垒，从而在符号资本的象征界面上捕捉有关社会行动的统一性符码。同样，在维特根斯坦关于游戏实践以及作为其运行背景的“生活形式”的思考中，亦潜藏着某种深刻的象征实践品格。从“语言游戏”到“遵守规则”，从“家族相似”到“生活形式”，贯穿着一种对哲学实质主义（philosophical substantialism）的拒斥，其意图即在于呈现这种蛰伏于生活实践内部的象征力量。因此，一方面，一种关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式的整体历史态度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是异质的，另一方面，那种潜存于生活肌理并发挥重要影响的象征性恰恰充当着某种用来平衡逻辑与伦理、理论与实践、哲学与行动的“非条件性条件”。

诚如很多论者业已揭示的，现代性规程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当代权衡在现实情境中凝缩为一种系统的危机叙事，并且由此引发了普遍的现代性焦虑。一方面，这一典型的现代情绪是渐趋多元复杂的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并且在以专业、技术、信息、后真相、后工业化等为基本要素的当代社会中不断发生增殖与转化；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性焦虑并非单纯是对现实情境的主观反映，其包含着一种旨在连结社会、个体、文化、心理等层面的象征逻辑，因此蕴含着某种深刻的实践品格。就此而言，所谓实践经济逻辑构想毋宁可被视作是对这一现代性状况的当代诊疗。作为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之象征化实践维度的一种社会学投射，基于符号资本的实践逻辑力求在一种实践经济的整体趋向性与个体行动的自主性之间保持某种动态平衡，并且在资本镜像下获得一种流转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伦理确认。在现代性场域中，基于这种象征性实践维度的逻辑审视，现代性批判所期许的理论效应与实践关切就并不是单纯地获得某种承纳或带离，而是在一种时时紧扣的伦理诫命中吁求一种趋向生成的“实践感（sense of practice）”，借此为应对当下日趋复杂、多元、变动的现代性状况提供重要的理论导向与实践动力。

Practical Logic and Ethical Assurance of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d on Symbolic Capital

HE Min-ni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Law &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modernity, the dilemma of interpret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s reflected in different views on the na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shown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It focuses 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balance of social spac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ymbolic capital” in social interpretation, the description of this dynamic feature is based on the operating structure of discursive practice and its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under economic metonymy. At the level of the macro field, symbolic capital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discursive practice, but also the source of motivation for social mobility. At the micro level, discursive practices shape the self-relationship of symbolic capital and lead symbolic capital to its ethical confirmation in the modern social field. Based on this,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symbolic capital” leads to a normative connotation of practical economic logic,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and practice for getting out of the interpretation dilemma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and copi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diverse contemporary reality power.

Keywords: Critique of Modernity, Symbolic Capital, Discursive Practice, Ethical Assurance

[责任编辑：谢雨佟]

^① 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30.